

李先念年譜

第三卷

《李先念傳》编写组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 编写

李先念年谱

第三卷 一九五七——一九六三

《李先念传》编写组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

编写

中央文献出版社

目 录

1957 年	(1)
1958 年	(52)
1959 年	(108)
1960 年	(205)
1961 年	(283)
1962 年	(400)
1963 年	(537)

1957 年 四十八岁

1月3日 下午，同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等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贺龙等出访回国。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和巴基斯坦等国情况的汇报。

1月6日 上午，同陈云、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¹⁾等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中国同苏联、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南斯拉夫的贸易问题。

△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的投资问题。

1月7日 同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到机场，为周恩来、贺龙等前往欧亚诸国访问送行。

1月8日 致信黄克诚⁽²⁾：在江西樟树修建大型机场，所需经费七千多万元中的国内拨款，一九五七年为好多？前天我与彭老总⁽³⁾商量，把这笔费用挤在今年军费之内，如何？外汇八千万美元，是否也放在军事订货之内？请告知。十二日，黄克诚复信李先念：樟树机场，建筑费（包括国内用费和外

[1] 聂荣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自然科学和国防工业。并兼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书记。

[2] 黄克诚，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

[3] 即彭德怀。

汇），我的意见应由国家特别开支，不宜列为军费内，特别是外汇部分，因国家给军队外汇一年一年减少，今年已很难维持各兵种器材维护和训练的需要。一九五七年国内列入国家开支军费有多余时可上缴给国家，因我对裁减军队究竟能减去多少军费还把握不大，目前列入国家计划军费多余上缴，对军队来说比较适当，在你处未定前可先由军费垫支。请考虑。二十五日，李先念将来信批给齐燕铭：开一次常务会议，以便提出具体意见。

1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指出：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1]、李先念、黄克诚组成，陈云任组长。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

1月12日 将国务院《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发行工作的指示》报送陈云。批语说：关于公债的指示，今年是应当发的。今年改变农村公债认购和交款办法，应当有这个指示发出。现送上，请核。十四日，陈云批示：以改为专为农民购买公债为好。

1月14日 将《关于改变乡干部工资待遇的方案》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批语说：乡干部工资问题，经多次研究，拟出了两个方案，无论哪个方案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问题在于不只是降了乡干部工资就可以解决，而表现出来的为上下之间的工资和左右之间的工资摆不平，这个问题也只能逐步去解决。无论哪个方案的结果，都意味着乡干部工资要降低很多，为此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一次会议研究解决。

[1] 薄一波，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 以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工作简报》形式，向周恩来报告有关部门研究若干主要农产品的预购工作情况。

△ 将《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稿批给胡乔木。批语说：文件经过几个同志座谈一下，提出了一些意见，并以修改的方式加上去了，或删改了一些内容。现送上，能用否？由你决定。建议印发出席会议^[1]的同志，尔后再修改。十七日，又将《指示》稿批送杨尚昆。批语说：《指示》稿已经讨论和乔木修改，建议先印发中央和省、市负责同志。二月八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指示》。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缓和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一九五六年巨大的进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须在一九五七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原定在一九五七年开工建设的项目应当进行具体分析，重新排队，把那些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都有可能和必须要施工的项目列入年度计划；把那些需要建设、已经设计、但目前限于物力和财力还不能施工的项目，列为预备项目。在工业、农业的生产中，在运输、邮电和商业的经营中，都必须尽一切办法广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特别是节约运动。在一九五七年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必须大量节减各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行政管理费用，严格限制人员的增加，合理调整现有机构和人员，逐步改变某些不合理的工资福利制度，并彻底地消灭铺张浪费现象。

1月15日 将《关于河北省大部厂矿下放问题的调查报

[1] 指1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告》报送陈云。批语说：中央复河北的电报稿，只将其中“但可选择试点”一句删掉即可。

1月17日、20日 主持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办公会议。在讲话中指出：一九五七年财政收入必须充分可靠，支出预算中，必须坚持先维持后发展的原则，财政和信贷必须结合好，现金要平衡。不如此，其结果必然是增加货币发行、突击抢购物资，这对稳定物价和经济建设都不利。财政收支指标算好后，财政部和经委商量马上和各部见面。

1月18日—27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思想动向、农村和经济问题。十八日，李先念出席会议开幕会。二十七日，在闭幕会的发言中说：一九五六年财政、信贷、商品都是入不敷出的，人员是增加的，这说明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都有若干冒进。一九五六年财政金融工作的主要经验是什么呢？依据我们的体会，就是财政、信贷和物资必须统一平衡。而物资平衡是统一平衡的基础；财政平衡是统一平衡的关键。财政、信贷和物资三者必须统一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遵循的一条客观规律。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农业收成极不稳定。这对于工业生产、商品流通及国家财政具有决定性影响，从而使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受到限制。因此，我们的经济只能适当地稳步发展，不能离开实际的可能前进；职工工资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是渐进的；劳动就业只能根据生产发展和事业的需要，陆续吸收。一九五七年的财政收支指标，还需要重新加以考虑。哪些事情能办，需要重新安排一下。不能办和没有力量办的，应当坚决地削减下来，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应当按照节约的原则，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不少同志对于大进军之后应该勒马缓行的意

义，并不是完全认识清楚了的，中央提出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这个发言已收入《李先念文选》，题为《财政、信贷、物资必须统一平衡》。

1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王稼祥^[1]关于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的情况汇报。

1月21日 主持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办公会议。会议讨论广西一九五七年预算问题。

1月28日 以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工作简报》形式，向周恩来报告一九五六年棉花收购情况和一九五七年应采取的有效措施。

1月下旬 出席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会议。会议研究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的落实问题，拟定具体实施方案。会议认为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重点是工业、商业和财政，建议在国务院领导下组织工业、交通、农林水利、文化教育、商业、财政等六个小组，分别由贾拓夫、王首道、邓子恢、林枫^[2]、程子华、李先念任组长。

2月1日 出席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会议。会议听取彭真关于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情况的汇报。

2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2月4日 主持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办公会议。在讲话中指出：（一）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经五人小组确定，按原定方案不变，实行归口包干，由五人小组负责承担后果。控制支出，

[1] 王稼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2] 林枫，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

今年八月份以前一概不追加预算。（二）今年国家财政预算（草案）有两条防线，一是把预算收支打稳妥，二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三）要系统研究经济情况，并掌握财政、金融、物资三者的平衡。（四）过去规定的各项税收法令和征收办法，都需要逐步加以研究和改变。新的工商税收办法和农业税征收的办法要通过立法手续。

△ 出席对外贸易部召开的电话会议。就上海有关方面不执行对英国签订的面粉合同一事发言说：我们不要简单地把这件事看成是笔生意，要认识到它的国际政治影响，不能因为受了批评就不积极干了，这是不对的。今后在外贸工作中，我们凡是与别人签订合同，就必须执行，要守信用，不能丢掉传统市场，丢了就是立场问题。外贸工作要讲究统一行动，不能自行其事，犯自由主义。

2月5日 出席中央财贸各部委党员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在讲话中说：最近，在党内和党外，对“社会主义究竟好不好？”有两种不同的态度。特别是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两种意见的分歧就更加明显。这一问题要讲清楚，否则对革命要发生动摇。匈牙利事件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利用匈牙利前领导人的严重错误，煽起敌我的斗争。匈牙利事件不是纠正错误，而是要推翻人民政权，其性质是敌我斗争的性质。我们不怕骂，我们的手脚不能让敌人束缚住，否则我们就要犯右倾错误！我们一不怕骂，二不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目前打不起来，将来也不一定。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双方互相怕，但他怕我们怕得狠些。国内的形势是：一九五六年的成绩是很大的，但计划订大了，预算订高了。基本上还是“三个平衡”的问题，即：财政平衡、金融平衡、物资平衡。认识还不是那样深刻。去年的财政预算打了十多亿元的赤字，

动用了上年的结余。我们犯了经验主义，影响到现金的不平衡，多发了十亿元的票子。再就是物资不平衡，表现在商业部库存减少二十亿元。实际上一九五六年是三十亿元左右的赤字。教训就是：多搞了基建、多增加了工资和农业贷款等，都要考虑有没有这么多的物资。改善生活，只有在增加生产的基本上才有可能。一九五六年因为有库存的物资，可以挡住了。这种冒进，可以一不可以二。再来就挡不住了。根据中央方针，为了缓和物资供应和财政紧张局面，一九五七年应当适当休整，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包括行政、事业，必须作适当的修正，并发动全国性的节约运动。财政上应当做到收支平衡，而且要有节余。

2月6日 出席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聘请苏联专家、发展养猪生产等问题。

2月7日 出席国务院第四十二次全体会议。在发言中说：公债推销了几年，农民完成得不大好，不是农民不愿买，而是农民分散，农村工作一多就把公债挤掉了。现在农村合作化了，拟改变公债推销办法，由个体农户分别认购分别缴款的办法，改为由农业社组织认购、代为缴款的办法。推销公债的时间，同农业社夏收或秋收预分结合起来。

△ 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决定：一九五七年适当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部分已开工项目要下马。

2月8日 主持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办公会议。在讲话中指出：一九五七年的社会集团购买力可以在一九五六年的基础上进行压缩，同时对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内容进行分析。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办法有：控制预算支出；压缩开支定额和开支标准；控制商品供应；降低企业成本；严格现金管理等。

2月9日 主持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办公会议。在讲话中指

出：几年来银行对商业部门的信贷结算制度基本上是起了作用的，但由于开始时没有经验，因此也存在不少缺点，所以需要回头来总结一下，做到“去芜存菁”。制度和监督是必须要有的一种约束，但是如果因此而束缚了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或者是规定过于繁琐，就必须加以反对。

2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出国访问情况的报告。

△ 主持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办公会议。在讲话中指出：（一）从各方面调查的材料来看，目前农村是一片光明，农民生活是改善了，但农民也还有一些意见。全国农业税负担是不重的。（二）一九五七年必须完成农业税法的改革工作。今年可考虑将经济作物区、富庶区的负担适当加重一点，对贫困区、山区的负担应当减轻，或只征一点点。

2月14日 主持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办公会议。在讲话中指出：（一）体制应改变，权利适当下放，在财政上可考虑实行中央、地方分成并固定三年不变的办法。（二）现行税制是极其繁琐的，这在多种经济成分存在，要用税制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是必要的。现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了。而工业和商业的利润很大，现行税制对企业经营管理是不利的，所以必须进行改革。（三）税制改革的目的是促进工商企业的经济核算，挤一部分工商业的利润，简化税制。（四）税制改革的办法，可以设想对主要产品，一个产品一个税率。采用这种办法的，要占到全部税收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比如差额税率，即按出厂价格减去成本、利润后，余额全部用税收拿回来。定期定额，即对数量不多、产值不大、没有财务计划的小厂，采用这种办法。此外，对有亏损的厂，可以限期免税。税制改革的步骤先简化是对的，现在就可以简化。但税制改革必须和商业退

利同时进行，一定要用税收的办法把商业退利拿回来。因此，一面简化，一面还要根据挤利的要求设计税率，提出方案。明年一月一日，大部分应纳税产品的产值要按新办法纳税。

△ 以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工作简报》形式，向周恩来报告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控制数字和信贷计划数字的修订情况。

2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关于召开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议和增补政协委员问题，由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徐冰^[1]研究提出名单后交常委审阅。另，全国政协党组由彭真任书记，李维汉任副书记，徐冰任秘书长。

2月20日 上午，同陈云、李富春、薄一波向周恩来汇报一九五七年财政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

2月20日—3月11日 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二十三日，李先念出席会议。在讲话中指出：增产节约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扩大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方法。这个方法对于中国的情况，特别是中国目前的具体情况来说，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积累资金速度慢，又不能依靠向外国借款，人民生活水平本来就不高，所以也不能过多依靠增加人民负担来积累资金。编制一九五七年地方预算草案，要本着增产节约的精神进一步挖潜，统筹调剂，坚持地方预算收支平衡，同时要从全局观点出发，不能挤大公补小公，超计划的寅吃卯粮。三月十一日，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做财政经济工作，应当“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一九五七年的预算支出虽然比一九五六减少，但是仍然必须看到：我们的国家是在迅速前进着，党和人民政府给人民办了许

[1] 徐冰，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多好事。我们为人民办好事，不可能一下子全办完，这一代的人不可能把下一代人的事全办完。如果勉强去做，反而会“欲速不达”。现在提出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不能挤大公补小公；不能吃“过头粮”；不能吃“老本”。我们的经济是计划经济，必须正确处理重工业同轻工业、积累同消费等一系列的比例关系问题。为了保持国民经济中各种比例关系相互适应，国家手中有一定的储备力量是必要的，这也可以说是计划经济的特点之一。财政部门要重视研究经济情况，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和手工业走上了合作化道路以后，我国的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过去的一套财政管理制度光靠修修补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经济情况变了，而财政制度仍然不变，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因此，财政部门应当下决心修改现行的一套财政制度，并且一定要根据中国的情况去修改旧的制度和拟定新的制度。为了做好这件工作，财政部门的同志应当把过去七年来的经验加以总结，并且研究一下解放前旧中国的财政制度。对于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尤其是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也要加以研究。要修改现行的财政制度，要提高今后财政工作的水平，财政部门还必须注意研究经济情况。做财政工作而不研究经济情况是很危险的，总有一天会犯错误的。今后财政部门一定要注意研究经济指标，研究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方面的经济动态，提出自己的意见，报请领导上考虑。归纳起来说，就是要“了解情况，提出意见，服从决定”。在研究经济情况的时候，要注意研究当前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要研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工种的职工的工资差别问题、学徒工和临时工的工资问题、职工的休假制度问题、老年职工退休待遇问题、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标准问题。还要研究人

口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问题。这些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但同财政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财政部门是应当加以研究的。这个总结报告已收入《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并以两文的形式各选一部分，题为《编制地方预算必须注意的问题》和《财政部门要重视研究经济情况》。

2月26日 主持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办公会议。在讲话中指出：过去几年来，银行在商业信贷工作上，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今后对商业贷款掌握的原则，应当根据国家的政策分别对待。对贷款的使用，要采取措施进行控制。关于商业信贷计划管理问题，原则上可以放到省市去管理，但是应该有适当控制。此外，为了统一安排市场，掌握货币流通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及各级银行仍应该把季度的综合信贷、现金计划健全起来，这对工作是有利的。

2月27日 以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工作简报》形式，向周恩来报告商业部系统的组织机构设置和领导关系问题。

2月2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由陈云主持、李先念参与起草、经毛泽东和周恩来修改而成的《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决定》规定：今后全国生猪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百分之十三点六四，农户每出售一头肥猪可留用八斤至十斤猪肉。

3月4日 出席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在讲话中指出：去年有一个时候，有些同志有这样的说法，粮食在我国已经成为大问题了。我认为这种说法未免言之过早。在粮食问题上，应该肯定，实现合作化包含有粮食状况好转的可能性。但请同志们记住三条：一是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生产和需要之间存在很大矛盾，这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由于我国耕地面积少，资源有限，所以这矛盾将是经常存在着、长期存在着的。二是人口增长太快。以前一年增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每人每年

要五百斤粮食，按一千五百万人计算，一年就是七十五亿斤。所以节育成了政治问题。以前不敢宣传，怕人说是马尔萨斯主义⁽¹⁾。现在对节育要公开宣传，人口生育不能无计划。三是增产粮食和发展副业生产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也有很大的矛盾。总之，我国人多、地少、生产技术还落后，增产粮食是件头等大事，不能掉以轻心。这个讲话的节录已收入《李先念文选》，题为《粮食问题不可掉以轻心》。

△ 听取各省市关于财政体制问题座谈会情况的汇报。

3月7日 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就邓子恢提出按原定计划修建三门峡水库问题，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交书面处理意见。意见认为：为了发展我国农业，必须有计划地治理为害最大的几条水系，首先是黄河、淮河、海河水系。但治理这些水系要花很多钱，用很多材料，一个一个地单独批准开工，势必造成应该治与暂时不可能治、摊子已经摆开而财力物力难以为继的矛盾。黄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需要治的，但在尚未确定全国水利工程全盘规划和进度之前，五人小组同意国家经委和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九五七年对三门峡水库工程暂时“勒马”的办法，先投资五千万元开工，摊子不要铺得太大。原定一九六一年竣工是不可能的，规模也可能要有些改变。四月十三日，三门峡水库工程正式开工。

3月9日、10日、13日 同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成员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财政预算、国民

[1] 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主义是指他创立的人口理论。他认为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人口以几何数列增长，而生活资料以算术数列增长，因此人口必定发生过剩现象，于是出现饥饿、战争和疫病等。但道德的抑制（包括禁欲、无力赡养子女者不得结婚）可使生活资料和人口之间恢复平衡。

经济计划和各省市经济计划安排的问题。

3月9日 同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到机场，迎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和国总理威廉·西罗基及其率领的政府代表团。晚，威廉·西罗基和夫人拜会毛泽东和周恩来时，李先念在座。十日晚，出席周恩来为威廉·西罗基及其一行而举行的招待宴会。

△ 接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贸易部部长基·恩杰拉及其率领的政府贸易代表团。

3月10日 同陈云、薄一波、习仲勋、钱俊瑞等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

3月12日 将中共中央复云南省委关于边疆特殊补助费问题的请示批送杨尚昆。批语说：一九五七年已解决五百万元。十七日，杨尚昆报告李先念：谭震林对中共中央的批复有不同意见，请你再看看。十九日，李先念批复杨尚昆、谭震林：今年预算实则紧张，到年终执行的结果可能会好些，但现在还有三亿三千万元尚难平衡。云南边境费已与于一川^[1]谈过，今年只能为五百万元，他也同意，只是还要加些，我意还是依此电文发为好。

3月14日 主持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办公会议。在讲话中指出：对工作的估价要提得恰当，不恰当就会影响干部的积极性。银行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强调节约使用资金并不算错。缺点并不是方针政策上的错误，而只是工作制度上的问题。制度要作到供应企业资金的需要并促其节约使用，而且又要简化。制度规定得繁杂、机械，就会脱离实际，行不通，形成过去“明紧暗松”的现象。要学习苏联的经验，但是要纠正教

[1] 于一川，时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兼省财贸办公室主任。

条主义的偏向，同时也要研究吸收我国过去银行的一些简便易行的好经验。

△ 以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工作简报》形式，向周恩来报告几种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问题。十九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一九五七年预购主要农产品的指示》。

3月16日 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请求中央增拨救灾经费的报告》批给袁任远、刘墉如、牛佩琮^[1]：请在明天或后天拟定办法，即以何方式、给多少数目为好。并请拟出电报代中共中央复。

3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研究工人阶级中几个问题的通知》。

△ 主持起草《关于一九五六年财政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预算安排的说明提要》。二十二日，在杭州就上述内容向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作具体汇报。

3月23日 国务院转发财政部、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关于整顿现行附加工资提取办法的报告》。《报告》中说：我国国营企业附加工资的提取比例是根据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政务院财经委颁布的有关规定执行的。提取比例（占工资总额）为：工会经费占百分之二，劳动保险金占百分之三，由企业行政方面直接支付的劳动保险费平均为百分之三点二四，医药卫生补贴费占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福利补助基金占百分之二点五。执行上述规定以来，由于就业人数和工资总额每年均有增加，职工平均工资有所提高，因此工会经费、医药卫生

[1] 袁任远，时任内务部副部长；刘墉如，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牛佩琮，时任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副主任。